

第2典 地域文化
第3典 民族文化
第4典 文化制度文化

第6典 学术

第7典 科学技术

第8典 文艺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第1典 历史文化沿革

中华文化
通志

第5典

【教化与礼仪】

智育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汉民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5 典

【教化与礼仪】

智育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智 育 志

作者简介

朱汉民,1954年生。1978年就读于湖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湖南大学教授,兼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副院长。著有《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圣王理想的幻灭》、《湖湘学派源流》(合著)等。发表论文50多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智育志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宏观背景,记载和论述了中国智育的发展历史。本志首先记述了中国古代智育历史的演进过程,展示了从中国远古开始到晚清时期智育方面的演变发展的历史。接着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智育思想、智育内容、智育实践的形式等。在智育思想方面,主要从智育任务论、智育过程论、智育原则论、智育方法论等方面综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对智育问题思想理论及其特色。在智育内容方面,从经学、语文、政治、科技等方面展示了中国古代丰富多采的智育内容。在智育实践的基本形式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智育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教学组织形式。最后,本志论述了中国近代、现代智育变革的历程,从智育思想、智育制度两个方面,记叙了洋务运动以来的智育思想以及智育制度的变革,展示了近代智育的变革历程和发展趋势。全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客观地记述了中国智育的历史,展现了中国智育的辉煌成就和民族特色,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它的不足之处及其变革趋向。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智育的历史演进	14
第一节 智育的起源及夏商周三代的智育	14
一、原始社会智育的萌芽	14
二、文字的出现和学校智育的兴起	18
三、“六艺”与智育	22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智育	29
一、士的崛起与智育的发展	30
二、丰富多采的智育思想	38
第三节 汉唐时期的智育	48
一、汉唐的文教政策与智育	48
二、汉唐的教育体制与智育	54
三、汉唐的学术风尚与智育思想	61
第四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智育	70
一、宋元明清的文教政策与智育	71
二、宋元明清的教育体制与智育	76
三、宋元明清的学术思潮与智育思想	81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智育思想	93
第一节 智育任务论	94
一、授学	94
二、习术	98
三、传道	101
四、道、学、术之间的关系	104
第二节 智育过程论	110
一、智育过程论的形成和发展	111
二、智育过程论的理论特色	118
第三节 智育原则论	124
一、智德统一的原则	124
二、学思结合的原则	129
三、知行统一的原则	134
第四节 智育方法论	139
一、问答法	140
二、讲述法	142
三、会讲论辩法	144
四、阅读指导法	148
五、因材施教法	153
六、循序渐进法	155
七、启发诱导法	157
 第三章 中国古代智育的基本内容	 160
第一节 经学	160
一、经学教育的主要典籍	161
二、经学教育中的智育内容	165
三、经学教育流派及其智育特点	172

第二节 语文·····	175
一、专门科目的语文教学·····	176
二、写作教学·····	181
三、蒙学中的语文教学·····	186
第三节 治道和治术·····	192
一、“六艺之教”和先秦私学的治道教育·····	193
二、汉唐的政治教育·····	196
三、宋以后分斋、分科的“治事”教学·····	198
四、史学教育中的治道、治术内容·····	199
第四节 科学技术·····	202
一、学校及职官的科技教育·····	202
二、社会科技教育·····	208
三、蒙学中的科普常识教育·····	211
 第四章 中国古代智育的实践形式·····	 215
第一节 中国古代智育的社会组织形式·····	215
一、官学·····	215
二、私学·····	222
三、家庭教育·····	230
四、社会教育·····	233
第二节 中国古代智育的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手段·····	237
一、教学组织形式·····	237
二、课程·····	251
三、学业考核·····	256
 第五章 中国近代智育的变革·····	 261
第一节 中国近代智育思想的变革·····	262

一、龚、魏等“新学”的智育思想	262
二、洋务派的智育思想	265
三、维新派的智育思想	270
四、民主革命派的智育思想	280
第二节 中国近代智育制度的变革	286
一、洋务运动和新教育体制	287
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295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智育改革	303
 第六章 中国现代智育的变革	307
第一节 中国现代智育思想的变革	307
一、胡适及其实用主义的智育思想	308
二、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民主主义者的智育思想	313
三、三民主义的智育思想	321
四、马克思主义智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326
第二节 中国现代智育制度的改革	336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教育改革	336
二、国民政府的学制改革	341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改革(1949年前)	347
 参考文献	359

导 言

智育志是关于中国智育历史的记载和描述。在全面展开对中国智育历史的记述之前,我们首先应知道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智育?智育和文化的关系怎样?智育志应该记述哪些范围?本智育志的记述特点是什么?

一、什么是智育

智育是一个现代教育学的概念,其涵义是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技能、启迪发展受教育者的智力的教育活动。智育只是人类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智育须和德育、体育、美育等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人类教育。但是,智育有其特有的重要职能,它是将人类创造的文明和积累的知识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以实现人类知识、智力的保存和发展。所以,自从人类教育发生起,智育就在人类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知识系统日益丰富,人类智力因素的要求日益增多,智育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中,虽然并没有形成专门而系统的智育理论,甚至极少使用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智育”概念,但是,中国古代

的教育家、思想家却提出了一些与智育相接近的概念,并且非常深入地探讨了智育方面的理论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智育思想。

在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与“智育”概念最有关、最接近的概念是“智”与“学”。首先看“智”的概念。在先秦的文献典籍中,多有对“智”的论述或定义,在许多地方,“智”与“知”常常通用。《论语》中,孔子曾多处论述了“智”,他说:“知者不惑。”(《论语·宪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两处的“知”均同于“智”,前者认为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后者强调对知与不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智”。显然,这里是从聪明、才智、智慧的意义上来定义“智”。这是对“智”的一个比较通用的理解和解释,当时及以后许多思想家均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定义“智”的。另外,也有许多思想家从智力、能力或知识方面来定义“智”。《墨子》曾经给“智”下个定义:“恕,明也。”(《墨子·经上》)此处的“恕”即古“智”字,其含义是一种明察事物的智力。这种智力又是以主体已掌握的知识为前提的,《墨子·经说上》云:“恕:恕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这里在定义“智”时,是指人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去探讨事物,就能获得明晓的认知能力。这时,“智”不仅是一种能认识事物的智力,还包括已经掌握的知识。荀子也曾给“智”下了个定义,他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他认为“智”就是一种正确判断是非的智慧和能力。他在另一处也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这里的“所以知”,是指一种认识能力或智力;这里所言的“智”,则是指人的认识、知识若能与客观事物相合,便是那些正确的知识。可见,荀子也是从智力、知识两个方面来定义“智”的。西汉扬雄亦作如是说:“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法言·问道》)他认为“智”就是知道一切,能够利用不用的东西,使无益的变得有益。这里,“智”既是认识的知识,又是一种智慧和能力。还有认为“智”是一种创造能力,《周礼·考工

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这里，“智者”和“巧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创造能力，后者则只能模仿。从上面所列举的材料来看，先秦文献所论述到的“智”，包含着智育所要发展的智慧、聪明和所要传授的知识技能等含义。

在古代，“学”也是一个和智育的意义有关的概念。“学”的本义无非是学习、仿效。《尚书·说命下》云：“学于古训，乃有获。”“学”作为一个动词，总是指对他人的经验、知识、技能及智慧的学习和仿效，因此，古代思想家们总是将“学”与“智”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尽管也有一些思想家认为有一些“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但他们基本上都承认，一般人都须是“学而知之”的。因此，他们常常将“学”与“智”放在一起考虑。孔子认为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并将人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均看作是学习的结果，他说：“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论语·阳货》）“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荀子·法行》）在这里，他将智（“知”）、能与学联系起来，认为“学”是获得智慧、能力以及知识的根本途径。以后的教育家、思想家们也往往是将“学”与“智”联系起来。《中庸》二〇章云：“好学近乎知（智）。”这里提出好学是获得知识、发展智力的途径。《墨子·经说下》云：“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必寡。”这里指出，智少而不学习，必然是孤陋寡闻。《荀子·儒效》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为学乎！’”荀子认为通过“为学”，即可使人由愚蠢而变得聪明。宋张载《理窟·义理》云：“人不知学，其任智自以为人莫及，以理观之，其用智乃痴耳。”他认为不通过学，其智乃是一种“痴”，这就绝不是真正的智。由此可见，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主张“学”是达到“智”的根本途径和手段，那么，这里所言的“学”，均可以理解为现代的智育。

另还有一个与智、学非常接近的概念，即是知。“知”作为动词，常常与“学”接近，指获得认识、知识。《荀子·解蔽》云：“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这里所言“知”，指去认识并获取知识。“知”作

为名词,又往往接近于“智”,意指一种认知能力和智慧。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所以,“知”也是一个和智育很有联系的概念。

这里是从古代智育方面的概念,以证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丰富的智育思想。事实上,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们早就深入探讨了許多智育理论的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智育思想。他们虽然很少有关智育的专论和专著,但在论述到有关教育、人才等方面的问题时,则对智育理论问题发表了很深刻的见解。对诸如智育与人的发展、智育与德育、智育任务中的知识、智力和技能三者之间的关系、智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成系统的见解。这些智育思想、智育理论反映了古代丰富多彩的智育实践,因而是中国几千年教育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它们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故而对现代的智育论、教学论均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近代以来,开始出现了专门的“智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智育理论。近代一些思想家、教育家在引入西方教育科学理论的同时,开始系统地探讨智育理论问题。严复批判了中国传统德育为本的思想,提出智、德、力(体)、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论,他不仅明确地提出“智育”概念,并将智育放在教育中的最重要地位。他说:“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①,“天心欲启大同世,国以民德为劣优。我曹爱国起求学,德、智、体育须交修。”^②严复明确提出“智育”的概念,并倡导改革智育教学的内容,传授那些为国为民所能利用的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一切,均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智育的变革。此后,智育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均获得了重大发展,而且,这种新的智育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和现代教育接轨。

智育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的变化,反映了智育的发展本身受

①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

② 同上书,第689页。